

# 两岸近代史学界交流与合作的纽带

——“蒋介石与抗战时期的中国学术研讨会”述评

李在全

蒋介石,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一位绕不开的人物,不研究蒋介石,我们便讲不清国民党史,也道不明民国史,自然也不能全面把握20世纪的中国史——蒋氏无疑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必须直面的人物。

一时代有一时代之学术。就史学而言,其发展与史料的发现相关,也与外部的环境相联。近年来,随着相关史料的开放,尤其是蒋介石日记的利用,有关蒋介石的研究已经成为民国史、近代史研究的学术增长点。海峡两岸关系的改善与发展,也为两岸近代史学界共同研究蒋介石提供了良好的学术环境。

继两岸学者于2010年1月共同在台北举行“蒋介石人际关系网络学术研讨会”、2011年6月在花莲举行“蒋介石日常生活学术研讨会”之后,2013年6月25日至27日,两岸学者再次聚首台湾宜兰明池山庄,举行“蒋介石与抗战时期的中国学术研讨会”。此次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与台湾中正文教基金会、政治大学历史系、政治大学人文中心共同主办,来自海峡两岸科研机构与高等院校的30多名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会议,提交论文19篇。

大体而言,此次研讨会可分为国际秩序与中外关系、党派与人物、战备与战时事务三大主题,兹分别述评。

## 一、国际秩序与中外关系

吕芳上(台北“国史馆”)《蒋中正、开罗会议与战后东亚新秩序的形成》认为,从1943年6月起,蒋即着手准备并思考开罗会议事宜,11月他率团赴会,与丘吉尔、罗斯福对东亚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其中包括三国联合反攻缅甸、中国领土收回、中国周边国家特别是殖民地何去何从、同盟国在战后处置日本、战后中美军事同盟及经济合作等问题。在蒋看来,开罗会议的召开是中国外交一大胜利,会议“以政治的收获为第一,军事次之,经济又次之。然皆获得相当成就。”但也有与期望相当落差之处,因为中国是大而弱的国家,欧美大国在政策上的重欧轻亚,不免对中国存有偏见。蒋在日记中的诸多感受,显示弱国领导人内心的苦楚,也道出弱国与大国的外交博弈。

李朝津(台北大学历史系)《重塑世界:抗战时期中国对战后世界的发想与实践》,主要探讨珍珠港事变前后,当同盟国联盟势态逐渐形成之际,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国政府领导层如何开始构思一个新的国际体系及其推动方式。作者从“同盟架构的建立”、“设立战后政策机构”、“计划战后”等

方面加以探究,认为抗战时期中国也设想了战后的世界格局并为之努力,为战后联合国的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安排作出了贡献。

张静(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蒋介石与抗战时期的国民外交——以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战时活动为中心》,讨论了战时国民外交的相关问题。太平洋国际学会成立于1925年,是以亚洲太平洋区域的政治、经济、社会、外交、文化、民族、宗教等问题为研究内容的非政府国际组织,总部设在美国,在中国设有分会。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原本是以推行国民外交为己任的纯粹的民间组织,但在抗战期间,为摆脱困境,进行对外交往活动,而求助于国民政府。作者认为,对该学会而言,来自政府的资助是一把双刃剑:在帮助其解决经费困难的同时,又使国民外交活动受到政府的渗透、控制、掣肘,牺牲了自身的独立性,损害了该学会作为民间组织的固有价值。

汪朝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抗战胜利的喜悦与对日处置的纠结——由蒋介石日记观其战后对日处置的一面》,认为战后蒋对日处置具有双面性特质,呈现出矛盾纠结的心态,即一方面对抗战胜利感到喜悦与欢欣,另一方面又希望得到投降日军在接收中的合作,不无私心自用之举,这源出于蒋介石对当时情势的判断,但他也为此付出了一定的代价。

李君山(台湾中兴大学历史系)《抗战时期蒋介石对中日关系的擘画(1937—1945)》,探讨自1937年至1945年间,蒋对于中日关系的现状与未来所作的分析和所持的态度。这8年间,中日两国处于战争状态,“擘画”包括以下四项重点:中日和战的前途;对于战局的评估与战略的思考;对于日本及周边列强(特别是美、英、苏)关系变化的观察;1941年珍珠港事变以后,对于二战结束后中日关系的调整以及整个世界格局的看法。作者认为,上述四项重点,实际是与时俱变,随着大环境演进而分其轻重。当中日战争刚爆发,两国都处在和、战的歧路,蒋对和、战前途的思考,与“和平工作”的进行,就形成当务之急;1938年以后,战争确定长期化、持久化,蒋对于战局、战略的评估,对于太平洋列强连环性、世界大战的期待,自然超过对于“和平工作”的兴趣;1941年底至1945年,中日战争终于和二战合流,蒋已经有余裕着眼战后国共、美苏的可能冲突,布局新的中日关系。

吴淑凤(台北“国史馆”)《中国抗战下的澳门角色》,主要讨论澳门在抗战时期扮演何种角色,与抗战后期国民政府对收回澳门主权的思考。澳门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澳门问题背后牵涉的是中国与葡萄牙的关系问题。作者认为,在1938年10月广东沦陷之前,澳门是求自保;广东沦陷后,澳门依附日本,作为日本军事基地供应者。在抗战后期,国民政府曾积极谋求收回澳门主权,并发生中国军队封锁澳门事件,事发后,葡澳政府深知事态严重,于是透过外交人员努力斡旋,展现合作态度。与此同时,国民政府认为当时收回澳门时机尚未成熟,故解除封锁,因此也影响到战后中国对于收回澳门主权的态度。

## 二、党派与人物

金以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蒋介石与政学系》认为,在蒋控制下的各政治派系中,CC系和黄埔系都有较明确的组织形态;孔、宋与蒋则是牢不可破的姻亲关系;而政学系到底由哪些成员组成,始终是众说纷纭。作者主要利用民国时期与政学系相关的人物日记、年谱及回忆录等文献,梳理政学系的主要人物谱系,探讨他们是如何影响政权及其与CC系、黄埔系的关系。作者认为,蒋介石与政学系之间的关系,大致可总结为以下几点:政学系主要帮助蒋控制中央政府各部委或出任封疆大吏;有关政府和国民党内的政治设计和重大人事任免为蒋提供意见;协助蒋与党外政治团体和中共沟通、交流;在国际交涉和财政金融方面,为蒋分忧

解难。

陈立文(台北“国史馆”)《蒋介石心中的宋美龄》,考察了宋美龄自1927年嫁蒋,直至1975年蒋去世,两人近半个世纪的婚姻史。从宋美龄的角度看,她在这段婚姻中经历了什么转变?作者认为,这可以从宋美龄的个体成长史中求取部分答案。作者将此过程分为以下几个阶段:1. 从传统闺阁女到时代新女性(1897—1927):美式教育与宗教的影响;2. 从窈窕淑女到革命妇女(1927—1937),主要表现在新生活运动中,宋跟随蒋到各地方巡视,使她不断和民众接触,被授予权力去推动新生活运动;3. 从中国宋美龄到世界蒋夫人(1937—1945),在此期间,宋美龄接受战火的洗礼,继续推动新生活运动,并努力推动妇女运动;4. 永远的第一夫人,即1950年宋从美国回到台湾,陪同蒋“复行视事”那时起,更决定了她夫唱妇随的角色。

邵铭煌(台湾政治大学图档所)《河内三月风暴:蒋中正与汪精卫之最后决裂》讨论了蒋汪之间的复杂关系史。1931年九一八国难发生后,蒋、汪捐弃嫌隙,携手合作,维持6年,到1938年12月,因和、战立场而分道扬镳。1939年3月21日,河内发生刺汪事件,结果是汪随从秘书被枪击身亡。这宗刺杀事件,成为汪、蒋最后决裂之关键。但此宗事件似有蹊跷,启人疑窦,不免臆测纷纭。作者根据大量史料证据,对此事件前后进行细致梳理,但很多细节仍待细究。作者认为,河内血案,军统所为,早已成定论,但主导者戴笠的史料一直未见直接证据,反而对于参与者高宗武的制裁,证据确凿,高宗武事后回忆判断系日本人主导的离间谋略,提供了日后再研究的价值。

罗敏(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和俄制共”:蒋介石与抗战初期的国共关系》,认为蒋对中共政策大致经历“编共而不容共”、“和俄制共”、“内求国共合并,外与俄再进一步合作”、“抗倭剿共双管齐下”的变化过程。易言之,随着日军对华攻势因战线拉长而逐渐减弱,加之苏联因素逐渐淡出,以及中共自身所处的位置,在诸多内外因素的综合作用下,蒋对中共方针由抗战爆发后的“合作”又回到“剿共”的老路上。

王良卿(台湾暨南大学历史系)《对于三民主义青年团成立背景的再考察》指出,1930年代前期,由于预备党员制未能充分发挥效果,国民党员经常提议仿效俄、意、德等国家的青年动员经验,建立青年团,用以作为党员资格训育期中的并行或是替代办法,CC系亦如此主张。在中国救亡图存的年代,这些设立青年团的吁求随着独裁政体国家令人瞩目的国力表现,而被想象为民族复兴宏业必然要借重的方法之一:它既是战争动员体制下的利器,也是创造党国“继起之生命”的必由之径。作者认为,蒋了解并且相信相关舆论针对这种青年组训形式所开展出来的正面论述,在政局动荡诡谲的1935年,蒋赋予力行社势力权责,将高中以上学生集合进行军事、政治训练,他也注意到青年团机制所涵摄的军事化行动特质可以厚植战争动员的力量,曾考虑催请力行社组织青年团,这可能是日后这支拥蒋势力得以在相当程度上衔接三青团的早期重要线索。

贾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三民主义青年团与抗战》,按照抗战进程的顺序(分初期、中期、后期),对三民主义青年团(简称“三青团”)的抗战活动作了比较完整的叙述和分析。抗战期间,各地三青团员积极参加抗战工作,其方式有直接与间接之分:有的团员参加敌后游击队或战地服务队,拿起武器直接与日军进行战斗;但更多的团员则是从事各种形式的战时服务和战地服务,如救护伤员、挖掘工事、运送弹药粮食、侦察敌情、打扫战场、维持秩序和交通、防空防毒、消防赈灾、疏散民众、救济难民、慰劳部队、从事宣传等,在不同程度上为抗战做出了贡献。无疑,三青团员的抗战活动是整个中华民族波澜壮阔的抗战史诗中的组成部分,在抗战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但三青团的抗战活动也存在弱点和弊病,如一些以三青团命名的游击队和战地服务队

与地方武装相混杂,良莠不分,发生扰民、害民现象;一些三青团干部经受不住战争考验,投降日伪成为汉奸,等等。

贺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和平运动”中的陶希圣》,以台北“国史馆”藏1939年至1940年间陶与汪、蒋等人的来往信函为基本史料,探讨“和平运动”中陶希圣的作用。陶是主和理论的提出者,但也是“和平运动”中的孤独者与迷失者。作者认为,从总体来看,关于“和平运动”,陶希圣在认识上是清醒的,在行为上却是游移和犹豫的,两者间存在着极大的矛盾。陶的性格使其在从事“和平运动”的过程中,思想与行为发生了分裂。其实,陶的半途而废充分说明“和平运动”是行不通的,如陶后来所言:“汪先生及周梅诸君的错误,就是失去了民族的壁垒,他们走进了日本军队宪兵的后方,想在日营里面和日帅讲和,且幻想可以得到独立自由的条件,成立自由的政府,一念之差,遂至于不可救药。”

赵席篸(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由汪精卫与知识分子交往侧看蒋汪的歧异》,主要聚焦抗战前后汪与身边重要知识分子的交往与聚散,藉此侧观汪、蒋面对当时立场相异的知识分子的态度。作者认为,将汪、蒋两人相比,汪似比蒋更有兼容并蓄的容量,尤其是对那些追求国家民主、法制而倡导人权的自由派。蒋身边最与其相和的知识分子当是拥护三民主义者,他们中的不少人也服膺汪,汪、蒋在对这类知识分子的态度上有所重合,也有所不同。追随汪者有不少是将三民主义视作具有社会主义的成分;追随蒋者很多认为三民主义不仅是社会主义,更是超越社会主义的思想。作者认为,知识分子与政治领导人,或基于思想理念,或基于政治立场,或是共同利益的结合,都不免以思想出发,因立场或利益而有分合。

### 三、战备与战时事务

皮国立(台湾中原大学通识教育中心)《整备与防御——中日战争中蒋介石对化学战的准备与应对》,并非从一般民众、受害者角度,而是从作为当时最高领导者蒋介石的角度出发,探究抗战时期的化学战。蒋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展开兵工业的现代化,这是军事现代化中极其重要的一环。在此过程中,蒋希望能有本土的人才,然而,中国起步比日本晚,人才也不如日本多,所以在新式化学武器、防具的筹备上,虽有自制,但还是需要从外国购买。因此,当抗战爆发后,武器和防具的供应都不足,在此情况下,在整个化学战中只能走向消极防御。虽然蒋也努力与外国接洽,发展化学战能力,但总体上还是受制于人,成效也有限。

杨善尧(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抗战前后蒋中正与军医制度的规划》,主要讨论国民政府对军医教育及行政制度的改革与规划以及蒋在此中所扮演的角色。蒋在黄埔练兵时,已有发展军医事业的想法,但直到抗战爆发的前几年,他逐渐掌控全国局面后,才有更多心力关注军医事业。蒋发现此时中国的军医人员数量明显不足、军医行政效率低落、军医教育质量不彰等问题。蒋通过任命相关军医领导人员,要求他们改革中国军医制度,蒋本人则以建议者及监督者的角色,参与军医制度的设计与规划。在中国军医系统中,逐渐形成德日与英美两种不同的医学理论体系,并形成派系之争。作者认为,在军医事业的设计与规划上,蒋历经不同的军医领导人与不同的派系观念等影响,并藉抗战这一长时间的军事活动,来获得其各种设计规划概念的实证经验,从而得以在战后完成军医派系的整合以及落实较为完善的军医制度。

刘维开(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蒋中正对川渝地方事务之指示——以手谕与批牍为例的探讨》,以蒋介石手谕为例,探讨蒋以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身份,对于重庆、四川地方事务之指示及执行情形。就蒋指示的内容而言,从防空疏散等攸关民众生命财产或地方自治等涉及地方行政制

度之问题,到汽车外两旁立人、人力货车担载物品过重、设立戒烟院与乞丐收容教练所、警察雨帽与雨衣必须联扣、垃圾应指定地点倾倒、清除清溪河中垃圾等应由地方政府负责之地方事务,可谓不论问题大小,均属于蒋关切的范围。作者认为,这与蒋往来于重庆市及周边地区,沿途所见闻有密切关系,亦与其个性有关。

黄道炫(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抗战时期的“抓壮丁”》,以抗战时期的兵役制度为研究对象,认为战时中国的巨额兵员需求,迫使政府不得不大规模征发壮丁。由于组织薄弱、社会管理落后、基层政权松散、政治腐败等多重原因,导致中国社会动员难以承受大规模征发需要,抓壮丁成为战时壮丁征发的重要现象。作者认为,壮丁的惨剧,政府虽然是作恶者,但某种程度上,政府和百姓实际又都是战争、政治、社会系列链条的牺牲品。随着时间的流逝,“抓壮丁”实际成为一个符号,讲述的是征兵中的不公和腐败,而这又和战争、政治、社会等一系列因素紧密相连。

许秀孟(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系)《初探抗战时期的逃难》,从难民的逃难选择与认知,踏上逃难之途须寻求资源,以及逃难中政府、社会组织的介入等方面,讨论抗战时期的逃难问题。作者认为,从逃难的过程中,女性往往被归为老弱病残者,不适长途跋涉,特别是家庭中的母亲,常常留守家园,而不愿随家人逃难;抗战中陆续有难民回乡,还有不断进出沦陷区的难民,显示出难民与家乡始终有程度不等的联系;抗战后方社会对蜂拥而至的难民,存在歧视与同情并存的现象,到后方遭受大轰炸后,深刻的同情心才不断被激化,使逃难成为普遍的经验;族友、同乡网络是逃难时最先寻求的资源,慈善组织、政府赈济机构的接济,使各种资源交杂相迭,难民从中寻求自救;由于难民数量庞大,政府施与紧急救助,发给难民证作为管理工具,从难民证所提供的逃难协助,以及其挟带的规范限制,显示战时的政府与社会之间,发展出某种权利、义务关系。

综观此次研讨会,两岸学者和谐与会,平等交流,气氛轻松,又不失严谨、热烈的学术辩难,不时擦出思想与智慧的火花。对于提交会议的论文,既有认真的讨论,又有坦诚的批评,还有必要的补充,体现了学术讨论的高水准。与会学者认为,经过学界的多年努力,有关蒋介石的研究已经取得了重要成果,这无疑加深了我们对20世纪中国历史的认识与理解,但很多问题仍待深入、细致探究。因此,两岸学者应该继续合作,深化交流,共同推进有关蒋介石的学术研究,使该研究成为两岸近代史学界学术交流与合作的纽带,并由此凝聚两岸的历史共识,以此推进海峡两岸关系的发展。

[作者李在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李志毓)